复印报刊资料

生态环境与保护

N2·月刊

2024年 第10期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1958

生态环境与保护

2024.10
（月刊）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
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心主任：徐拥军
总 编 辑：高自龙
副总编辑：钱　蓉　张安民

编 委 会
主　　任：马　中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包存宽　董战峰　马　中
毛显强　欧阳志云　潘家华
王灿发　王　毅　夏　光
于法稳　张世秋　张天柱
庄贵阳
执行编委：毛显强

责任编辑：张成龙　毕　乐
出版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
电　　话：(010)82504550-2153
(010)62515819　62515820
刊　　号：ISSN 1007-0508 / CN 11-4337/P
出版日期：每月2日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2-985
订　　购：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市场部
订购电话：(010)82503412/38/39/4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　　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　　号：344156031742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399信箱)
广告热线：(010)62514919
广告发布登记证：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128号

环境理论

3　“两山论”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　刘　勇

可持续发展论坛

12　全球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与挑战　傅伯杰、张军泽

16　从持续收获到永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近代源流与中国道路　陈　杨

环境经济与管理

27　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的经济效益　夏　勇等

52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及发展方式　于法稳

碳排放

58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实验　张自然、何　竞

81　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演进、区域差异及政策建议　李　鹏、史　丹

环境史学

94　民国时期云南思普沿边荒地开发与生态制约　耿　金

109　索引

112　英文目录

从持续收获到永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近代源流与中国道路

陈 杨

【摘 要】可持续发展理念常被视为一种起源于当代西方的环境保护思想。然而，基于对近代中西方林业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理念存在多条演化路径。西方“持续收获”林业思想于19世纪末进入中国，在战火频仍、灾害频发、国家羸弱、民族危亡的独特社会历史土壤中，孕育出了强调森林生态效益与为子孙后代考虑的永续利用思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永续发展思想。与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不同的是，中国永续发展思想始终强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的，自然的开发应当确保子孙万代永享其利。

【关 键 词】可持续收获；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环境治理话语

【作者简介】陈杨，男，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思想史与环境哲学（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24.3.44~55

【基金项目】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规课题“全球生态文明探索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意义及其推广路径研究”（23CCG17）。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国际环境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奠基性概念。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实现何种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角力和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议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所言，“无论是谁，只要能够以其自身的方式定义这一术语，就自动地在一场影响我们未来的重要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种出现在当代的、西方的环境保护理念，其主要内涵是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确立的。为破除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叙述，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部分非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挖掘各自文化传统中与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内涵相同或相似的观点理论，以证明各自具有悠久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然而，这种破除方式是以承认当代西方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前提的。对相关思想史的深入挖掘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存在多条演化路径，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只是其中的一条可能发展道路。与此不同，近现代中国特殊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孕育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永续发展思想道路。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历史源流辨析

在国内外环境思想研究中，可持续发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在西方环境保护浪潮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观点。国内外经典教材和研究论文，一般将可持续发展追溯至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而引起的世界范围内对资源限度的关注。此后，在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之中，“可持续的（sustainable）”和“发展（development）”首次以连用构成一个完整术语的方式出现在正式的书面语境中。[②]可持续发展核心内涵的基本确立则是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

告。此后,“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成为可持续发展较为通行的定义。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受到全球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关注则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召开。[4]

按照以上概念历史叙述,可持续发展理念首先出现在西方,并在西方学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才逐渐受到非西方国家的重视。于是,西方国家似乎无可置疑地成为环境保护的先觉者和领导者,非西方国家则成为有待被启蒙的学习者或模仿者。然而,以上历史叙述并不严谨,既缺乏对西方近代自然资源利用思想的历史研究,也缺乏对非西方文化中环境与发展相关思想应有的关注。这种叙述的流行,与国内外学者长期忽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想史研究直接相关。

这种忽视已经遭到国外一些学者的批评。美国学者杰里米·卡拉东纳(Jeremy Caradonna)认为当前西方相关研究很少涉及“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概念的起源,对其历史语焉不详,往往只用几段话带过,甚至会认为它是在1987年忽然出现的。[5]贾斯蒂斯·门萨(Justice Mensah)也认为,“虽然可持续发展在理论上已经得到普及和重视,这一概念的历史或演化却被忽视和低估……但是,概念的演化过程有助于预测未来的趋势和(理论的)缺陷,从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有益的指导”[6]。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近代源流,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将可持续发展与人口增长和资源的限度问题联系起来,将其追溯至18世纪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7]其二,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追求长期公共福祉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阿瑟·庇古(Arthur Pigou)的相关思想。[8]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将可持续发展理解为一种在有限资源边界下实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观点。然而,以此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较为狭隘,而且从历史逻辑看,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相关经济学思想虽然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发展,但很难说是后者的直接思想起源。一方面,人类对资源边界的认识古已有之,因循这一思路,荷兰学者亨克·范·宗(Henk Van Zon)甚至将可持续发展追溯至古代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希腊、罗马文明在面临环境和资源问题时产生的一些思想,将柏拉图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驱。[9]另一方面,对长期公共福祉的追求也是从古至今一种常见的观点,正如埃琳娜·卡瓦尼亚罗(Elena Cavagnaro)和乔治·柯里尔(George Curiel)指出的:“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一直在为自己、子孙以及群体寻找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10]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追溯至这类思想史上常见的观点,其实至多回答了在近代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现的思想背景,但是仍然没有指明该理念关键的、直接的思想起源。

鉴于以上问题,另有一些学者提供了第三种观点: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欧洲“持续收获(sustained-yield)”林业思想的直接继承。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是最早提出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之一,他在1993年就指出,关于“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清楚该术语的完整历史,但其起源似乎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持续收获’概念”[11]。这一观点获得许多环境思想史学者的承认和进一步补充发展。乌尔里希·格罗贝(Ulrich Grober)通过对词源和历史文献的追溯,认为“持续收获”是“我们现代概念(即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在布伦特报告发表很久之前,全世界的林业工作者已经使用‘持续收获林业’来讨论其工作中涉及的长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内容”。[12]2013年,欧洲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德国林学家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的《森林培育经济学》(*Sylvicultura Oeconomica*)出版300周年。此后,认为“持续收获”林业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直接思想先驱的观点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雷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夫·茂奇(Christof Mauch)认为卡洛维茨的“持续收获”思想和18世纪初期萨克森地区的持续收获林业实践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根源。[13]卡拉东纳也指出,“近年

来，卡洛维茨富有创新性的林业手册被认可为可持续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是非常正确的"[14]。

西方学者的以上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从近代林业"持续收获"思想逐渐演变而来的。该思想的孕育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科学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和法国政治家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其系统阐发者是卡洛维茨。[15]在《森林培育经济学》中，卡洛维茨具体讨论了木材持续收获的原则和具体实践方法，其中明确使用了 Nachhaltigkeit(持续性)概念。[16]"持续收获"思想在 18 世纪上半叶进一步发展，很快随着德国林业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而受到世界各国林业人员的关注。德语 Nachhaltigkeit 一词也在不同国家出现不同的翻译，该词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被译为"sustained yield(持续收获)"，在 1895 年的日本被译为"保续作业"[17]，在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则主要被译为"永续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持续收获"思想出现了不同的演化路径。在西方，美洲殖民地丰饶的自然资源极大地缓解了欧洲和美国自然资源尤其是木材资源紧缺的问题，但是出现了资源浪费、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持续收获"思想与进步主义观念结合，孕育出资源保护主义思想，而该思想最终塑造了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在中国，"持续收获"思想则与战火频仍、灾害频发、国家羸弱、民族危亡的独特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孕育出以强调森林生态效益、为子孙后代长远利益考虑以及通过改善环境实现民族复兴为特征的永续发展思想。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演进过程中的西方道路，而永续发展思想则是其中国道路。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近代起源及其西方演进道路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近代的直接思想起源是 17 世纪后半叶逐渐孕育形成的西方"持续收获"林业思想。但是，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持续收获"思想才逐渐进入美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并开启不同的思想演进道路。在近两百年间，"持续收获"思想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相对停滞的过程。

"持续收获"思想是在欧洲地区木材可能面临严重短缺的资源压力背景下出现的。在经历早期现代的大航海探险、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之后，西欧地区的森林遭到大规模滥伐，森林资源锐减。到 17 世纪后期，"木材饥荒"(timber famine)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18]17 世纪 60 年代初，伊夫林受英国海军委托，对可能面临的木材短缺问题展开研究。他于 1662 年发表关于持续提高木材产量的论文，[19]两年后，经过修订扩充，出版《森林》(*Sylva*)[20]一书。该书细致考察了约 80 种英国本地和国外树种，具体分析不同树种适应的气候土壤水分条件、其产生木材的特性等，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应对木材短缺最重要的手段是进行广泛的人工植树造林，并提出木材采伐的轮作制度。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柯尔贝尔领导的法国森林管理改革，他曾颁布法令：在一个地区进行采伐时，必须留有一定数量的成熟树木以便提供种子，而被采伐的区域应当通过播种和种植进行造林活动。在 1669 年实施的新的森林管理法律中，明确指出其指导原则是"根据生长潜力减少木材使用"(La réduction des usages à leur possibilité)。[21]

在总结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森林经营情况的基础上，并结合自身 30 多年的林业管理经验，卡洛维茨在 1713 年出版《森林培育经济学》。该书围绕着一个总问题展开："如何安排林木的保护和栽种，才能够实现持久、稳定和可持续的利用(nachhaltende Nutzung)？"卡洛维茨的回答，概言之，即在采伐老树的同时，必须通过播种、培育苗木、整地、栽种、抚育等技术措施抚育幼树，以此实现对森林的理性的、广泛的、负责任的和持续的管理。[22]

从伊夫林到卡洛维茨，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是如何应对木材短缺问题，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整体上不过是进行植树造林和有计划地采伐。这种在今天看来平常无奇的方案，需要放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去理解其意义。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丰饶自然观

就在西方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古希腊十分流行的自然观就是：宇宙作为充实的形式（plenum formarum），必定孕育、维持着所有可能出现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种类。[2]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曾一度抑制了这种观点。例如，因为“人的堕落”导致“自然的堕落”，曾经的伊甸园是丰饶的、充满活力的、宜居的，如今的自然则衰败了，甚至开始反抗人类。于是，大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人类“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堕落对自然的影响开始被认为是轻微的，或至少是可以通过人的干预而恢复其完美状态的。[3]西方流行的自然观返回到：万能而仁爱的神直接地照看着这个世界。因此，自然是丰饶的、完满的、充满神意的。自然的丰饶性原则重新获得认可，这一点在近代博物学传统中尤其凸显。正如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Glacken）指出：自然中的生命是富饶、多样和丰满的，这一原则在18世纪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的著作中臻于完美。[4]伊夫林活跃的时期，虽然稍早于布封的时代，但是自然丰饶论在当时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观点。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持续收获”思想的重要性得以彰显：伊夫林、卡洛维茨等人虽然在整体上承认自然的丰饶性，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在某些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期内自然的丰饶性是有限度的，自然资源的恢复能力也是有限的，需要人力的帮助。

18世纪早期，“持续收获”思想逐渐发展，欧洲一些地区出现了严格按照“持续收获”原则经营的林场。但是，在18世纪中后期，“持续收获”思想进入相对停滞或被忽视的时期。随着对美洲更深入的殖民掠夺和发达的海上贸易，欧洲本土的木材危机得到极大缓解。对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持续收获”思想显得没有用武之地。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曾这样描述19世纪美国森林资源利用状况，“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与我们森林相关的常用词还是‘用之不竭’（inexhaustible）。浪费木材曾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一种罪恶。在美国，对每个人来说似乎总有足够的木材和其他的一切，似乎世界没有尽头”，在当时，对普通美国人来说，那些森林保护的倡导者都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家和幻想者”，“保护森林的言论就如蚊子的嗡嗡声一样令人恼怒”。[5]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结束，获得原始森林和未开垦土地变得越来越困难，极度浪费的资源利用方式难以为继。尤其是以更直观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的美国学者，率先认识到需要以明智、审慎的方式实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于是，“持续收获”林业思想重新获得重视，并逐渐发展为现代资源保护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西方思想演进道路由此开启。

19世纪末，德国林学家伯纳德·弗尔诺（Bernhard Fernow）将“持续收获”思想带入美国，并逐渐受到重视。当时，正值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前夕。随着美国反垄断、反托拉斯的氛围日益高涨，“持续收获”思想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资源保护主义。弗尔诺后来成为美国农业部林务处长。他倡导以“持续收获”为原则对国有林地进行整体规划，并强调公共利益，反对资源浪费和资源垄断，他提出，“只有那些节俭地开发自然资源并避免由此产生的浪费的国家，才能够维持（maintain）其力量或确保其独立存在的持久性（continuance）”[6]。

1905年，平肖出任美国林业局局长，逐渐成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与弗尔诺一样，平肖也认为自然资源的垄断是完全不可接受的。[7]与弗尔诺不同的是，平肖提倡以一种整体的方式统筹利用自然资源。弗尔诺仍然深受欧洲“持续收获”思想的影响，将树木视为一种木材作物（wood crop）。在他看来，一片森林，如果不能够被砍伐，如果不生产木材，那么这种行为就“阻碍了森林增长的首要目标的实现，犯了经济上的错误”。[8]平肖则强调以一种整体的视角来看待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他认为木材、能源、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渔业、狩猎等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地球”。[9]

从弗尔诺到平肖的思想发展，可以看出，“持续

收获”思想被引入美国后，很快突破了以单一经济效益看待森林资源的局限性，并且超越林业领域而扩展到不同的自然资源利用领域，在与当时反垄断的进步主义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为以反对自然资源浪费和滥用、反对资源垄断、强调资源利用的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资源保护主义。

现代资源保护主义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认为虽然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同时受到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t)和“资源保护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但是在整体上，从1980年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到后来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使用者都更偏向于资源保护主义，更偏向于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宏观的资源利用政策。[31]

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对现代资源保护主义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它将环境问题、自然资源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虽然带有浓厚的资源保护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仍然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超越性。正如卡拉东纳指出的：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可持续性话语的出现，它包含“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社会变革哲学，以及对环境、经济和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影响的更动态的理解”[32]。而后《我们共同的未来》则进一步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与人口贫困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更加积极的系统的改革方案。[33]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西方的演进道路，虽然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美国超验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但是在整体上仍然是从近代“持续收获”林业思想到资源保护主义再到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一脉相承的。这条西方道路并非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唯一演化路径。在19、20世纪之交，近代林业“持续收获”思想不仅被引入资源丰饶的美国，而且几乎同一时期，也被引入许多非西方国家，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中国，“持续收获”思想遭遇到与美国相当不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处境以及强调“祖孙一体”的东方文化传统，由此走出了一条在自然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中强调永续利用和永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道路。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演进道路

19世纪后期，西方“持续收获”思想逐渐进入东亚。1895年，日本现代林业先驱志贺泰山在《森林经理学前编》中最早明确将Nachhaltigkeit翻译为“保续”，将Nachhaltsbetrieb翻译为“保续作业”，并在书中系统介绍了法正林原则和实践方法。[34]志贺泰山1888年毕业于德国著名的塔兰特林业高等学校(Forstliche Hochschule Tharandt)，后来成为东京林业局首任局长和东京大学林学教授，对日本现代森林经营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翻译的许多德语林业概念在日本沿用至今。1898年，奥田贞卫在《森林学》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伐木的保续作业原则，还提出了“保续的收获”概念。[35]

“持续收获”思想进入中国有两条路径。其一是20世纪初在对日本林学著作的翻译、编译过程中，“持续收获”思想逐渐为国内学界知晓。其二是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随着凌道扬、姚传法、郝景盛等接受欧美林业教育的学者回国，“持续收获”思想被直接从欧美带回国内。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林业中的“保续收获”在内涵上基本等同于西方“持续收获”思想，主要是指人工经营的林场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提供木材等直接经济效益。因此，“持续收获”思想最初进入中国时，也主要被认为是一种保持森林木材产出的作业方法。1900年，樊炳清翻译出版了奥田贞卫的《森林学》，这是中文世界最早的现代林业著作之一，“保续”“保续作业”“保续收获”等概念正是在此时进入中国的。[36]1913年，孙钺综合日本林学家本多静六、奥田贞卫等人的学说，编撰出版《实用森林学》，其中有大量篇幅讨论为实现“森林永久继续其产出最大之材积，则于其森林间连续不绝”而应遵循的作业原则。[37]1916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呈请大总统批文中，提议在沣浦、京汉铁路沿线及长江沿岸各地

乡村设立公会进行植树，也是为了实现“十年而后，次第成材，按年轮伐，利用无穷”。[38]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留学归国学者逐渐主导林学研究。这些学者较少使用从日本传来的“保续作业”等术语，而更多使用“永久利益”“永续作业”“永续收获”以及后来的“永续利用”等术语。从“保续作业”到“永续利用”的变化，不仅是术语上的转变，更显示出思想上的变革。在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近代自然灾害频发、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影响下，“持续收获”思想开始其独特的中国演进道路。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演进道路的第一阶段是从“持续收获”到“永续收获”，其主要特征是在时间维度上将森林预期效益的持续性无限拉长以致“永久”。这种特征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造福子孙后代的朴素观点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学者吸收了西方“持续收获”的林业经营模式，但是在思考林业效益时，具有更长的时间视野，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更强调世世代代子孙的长远利益。张百川在1929年向民国政府提议采取先进的林业经营模式，以使“富源可以长保。利权不致外溢，而林业亦可永续不断”。[39]葛天民和郭兆兴曾提出，“经营林业以达连续蓄积而图永久之利益为目的，……合理经营、适当保护以期维持永久之需要，则雄厚之富源可以保存于千百世之后焉”[40]。近代林业教育家曾济宽更加明确地指出林业需要为子孙后代考虑：“林业与其他事业不同，今日造林，必须数十年后方能得有大宗收入。因是造林者与利用者常非同一之人”，“吾人今日所植之林，更传之后世子孙采伐利用”。[41]殷良弼也曾指出，“经营林业，必令其生产物永远连续为原则。故合理的营林法，莫不行保续作业，成理想之法正林”[42]。此外，“永续收获”观点还从林业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国水土保持学的奠基人任承统在1934年就指出，“无论何种生产事业，应以能维持永久继续生产为原则”[43]。类似地倡导以西方“持续收获”原则经营农林牧渔产业，造福千秋万代子孙后人的观点，在近代农林教科书和报刊文章中相当普遍。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演进道路的第二阶段是从“永续收获”到“永续利用”，其主要特征是突破了“持续收获”思想单一关注木材持续生产的片面性并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永续利用”是一种强调森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综合利用思想，甚至在某些学者那里防灾减灾被视为森林最重要的效益。安事农和凌道扬在1929年出版的《森林的利益》中指出：林业经营“力谋其有形直接利益之光大，同时尤须发扬其无形之间接利益”，所谓间接利益是指“保安国土，维持社会之公共安宁”。[44]他们在书中以大部分篇幅阐述森林的十大间接利益，其中主要都是与防灾减灾相关的，并且提出通过植树建设像万里长城那样可以“永贻后人纪念”的防灾工程。[45]曾济宽也认为，经营林业有两大理由，其一是为后代积累财富，其二是减少灾害、保护国土安宁。[46]

更重要的是，“永续利用”思想与近代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国内发行的报纸、期刊和图书中有大量文章将农林业振兴、自然环境恢复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首要途径。例如，李士瀛就将“神州大陆，赤地千里，山林枯索，磊石磐磐，绝少碧黛岚翠之鲜丽，森林葱郁之美观”视为“中国近年土匪充炽，内争迭起，民不聊生，国无宁岁……危亡之祸，即在目前”的直接后果，并奋力疾呼：“岂我羲黄裔胄，已界衰微之期耶？”为此，他提出了设立林业专员、推广育苗和植树、普及林业教育等十项措施。[47]郝景盛更是直接指出：“中国之林业能否建设，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为此，他提倡推广“永续收获”的林业实践：“按照自然更新之方法，在林中空隙之地，又可栽培新林，老树伐除，幼树上长，一代一代，永生不已，形成永续林作业。现在之荒山，若都变成这样的森林，人民必富，中国必强！”[48]他还畅想在坚持植树造林后，祖国山川面貌能够焕然一新，民族复兴得以实现，子孙后代能够享受美好生活：“每当春光明媚之际，或惠风和畅之秋，携妻抱子，……到我们的大自然界之森林中去遨游，……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我们生活在这样优美的自然界中不更感

到历代列祖列宗给留下来的大地山河之可爱!"[49]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演进道路的第三阶段是从"永续利用"到"永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近代的永续利用思想,逐渐从一种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思想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的永续发展思想,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收获"思想已经与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孕育出独特的"永续利用"思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这种思想更多地停留在理论阶段,对现实的林业政策和环境治理的影响比较有限。事实上,民国时期发生的生态灾难,与清代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帝国主义的掠夺、连年战争的破坏和大规模毁林开荒的影响下,全国森林覆盖率从晚清时大约17%大幅下降至新中国成立时的12.5%,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森林破坏的最高峰。[50]永续利用思想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发展并付诸真正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号召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森林采伐后,应即进行迹地更新,育成新林,使森林延续不绝,源源利用"[51]。1962年,周恩来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愈伐愈多,愈多愈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52]这四句话后来发展为"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成为中国林业建设长期贯彻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地永远干下去"[53]。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渐形成,西方学者开始明确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几乎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明确使用"永续发展"这一概念。例如,1981年,柴恒忠以"永续发展"来理解森林的永续利用:"森林永续利用"是森林作为自然资源和作为生态系统的两方面都"达到质量上、数量上的永续发展"。[54]1984年,傅政德指出,"要保护自然,改造自然,使农业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永续发展"[55]。这一时期在林业、农业、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中使用和阐发"永续发展"的文献还有许多。这些文献几乎没有受到尚在形成中的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它们呈现的"永续发展"观点主要是从近现代中国的"永续收获"和"永续利用"思想发展而来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演进道路的延续。

20世纪90年代初,"永续发展"思想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在1992年4月全国第一次环保产业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的宋健发表题为"发展环保产业,保证永续发展"的讲话,其中提出在环境保护工作上,"我国的基本方针是: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永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宋健还认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正是'永续利用'思想的体现"。[56]

但是,也恰恰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永续发展思想和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出现了一段"合流期"。随着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可持续发展"一词成为世界范围流行的热词。中国政府文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文献中也开始大量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永续利用"和"永续发展"等词反而较少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和学者在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时,在内涵上与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始终存在一些差异。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语境中,可持续发展常常与永续发展思想中关于民族复兴和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长远福祉联系起来。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正是以"永续发展"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例如,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57]

进入21世纪,永续发展思想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2007年,在"生态文明"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同时,"永续发展"也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永续发展思想进一步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59]

四、中国永续发展思想与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比较

在全球环境治理话语体系中，“永续发展”长期被掩盖在“可持续发展”的光芒之下。当代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永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过是对西方“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不同翻译，并且认为中国大陆地区习惯使用“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台湾地区更习惯使用“永续发展”。[59]然而，对思想史的深入挖掘和重新梳理表明：中国永续发展思想有其自身的、深层的思想发展根脉，它与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两条不同的思想道路。虽然这两条道路都强调对自然的开发利用需要考虑长远利益以及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是由于在思想演进过程中各自受到相当不同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一些显著的差异。

首先，在自然观方面，从“持续收获”到资源保护主义再到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整体上都持有丰饶自然观，中国永续发展思想则是建立在近代中国自然资源匮乏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

在丰饶自然观的影响下，近代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资源匮乏是局部的、暂时的。虽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需要人力去帮助自然资源的恢复，但是就长期来看，上帝的仁慈确保丰饶的自然中不会出现永久的匮乏。《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就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包含着制约的因素——不是绝对的制约，而是由目前的技术状况和环境资源方面的社会组织造成的制约以及生物圈承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能力造成的制约。”[60]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丰饶自然观的假设，不存在某个神祇或自然本身来保证长远未来的资源持续性。而且在近代中国，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生态灾难频繁发生，甚至愈演愈烈。据统计，在1840年至1911年71年间，黄河流域曾发生“一般”以上洪灾27次；长江中下游发生“一般”以上洪灾17次。[61]因此，近代中国学者倾向于将能否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问题视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和兴旺发达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时间视野和代际问题上，中国永续发展思想将视野推向遥远的甚至无限未来的子孙后代，而无论是资源保护主义还是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往往在几代人的时间维度上关注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例如，平肖的资源保护哲学就秉持一种“当代人利益优先原则”。[62]他曾经毫不掩饰地指出，“认为资源保护只意味着为后代(future generations)而进行资源管理，这是一种根本性误解。不可能有更严重的错误了。资源保护的确包含着为未来而保护的含义，然而最重要的是承认当代人享有如下权利：在如此丰饶的国家中，为了最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必要需求而使用所有资源。资源保护首先要求实现这一代人的福祉。其次才是后代的福祉”[63]。类似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虽然指出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但是这里的后代主要是指几代人，考虑的时间跨度是几十年。美国哈佛大学彼得·罗杰斯(Peter P. Rogers)等人编写的可持续发展经典教材甚至认为，“我们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两代人的时间范畴内的……我们相信这才是最具有科学说服力的立场”[64]。

中国永续发展思想与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这种区别是中西方代际观、生命观差异的体现。中国传统生命观和代际伦理要求人们为后代子孙考虑。钱穆曾经概括道：中国人的生命是融合在世代传承之中的，上自父母，下及子孙，一线相承，大生命犹尚超其躯体小生命而存在。在家国与民族的语境下，子孙后代，本不区分你我：“群之生，其心相通，不限于家族血统之一线。身之外有家，家之外有邻里乡党，以至于有国有天下。同此人生，心生活皆相通，成一大生命”[65]。与此不同，西方人考虑代际问题时，常常抛弃血脉联结，采用功利主义的方式理解一

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关系。于是,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成为代际伦理争论的焦点。

更棘手的问题还在于,当涉及长远后代福祉时,功利主义会遭遇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因为未来世代尚未存在,效用的主体是缺失的,何种事物对未来世代具有效用也是不确定的。平肖的确指出过,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需要注意到"我们的后代不应当被剥夺他们所需的(资源)"[66]。然而这里的后代,更多的是指已经在世的子辈和孙辈。因为在考虑更遥远的后代时,平肖认为未来世代的需求是不确定的:"新的问题会持续地出现,美国人民会有新的需求。问题和需求将会要求新的资源保护哲学"[67]。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大生命的绵延可以比较轻易地化解后代福祉和后代需求不确定性问题。当代人的植树造林,既是对祖宗保存森林之美德的感念,又是对后代的荫庇。在这"祖孙一体"的大生命观中,持续收获的期限可以被推至无限遥远之未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永续发展思想是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一整体的、正面的目标紧密联系的。森林资源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状况,本就与近代内忧外患的时局紧密相关。清代后期至民国,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和滥伐我国东北地区、台湾和海南等地的森林资源。在国内和对外战争中,各地森林均遭受程度不同的破坏。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军"兵燹所至,无树不伐"。连年的灾荒,则迫使民众或以伐木为生,或肆意开荒,所造成的破坏也极其严重。[68]可以说,千里赤地、童山濯濯、草木焦枯正是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近代劫难在自然环境中的客观反映。欧洲"持续收获"思想在国家羸弱、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被引入中国,振兴林业和恢复自然生态的事业很快便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联系起来。正如近代学者高声疾呼的,"亡森林即所以亡国,一国的森林事业不发达,其国家社会必将均蒙不利",因而需要"全国动员,努力造林……不然的话,民族复兴运动,永远不切实际"。[69]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续发展更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从"永续收获"到"永续利用"再到"永续发展"的中国演进道路中,实现民族复兴和长久兴旺发达的宏伟目标逐渐上升为中国永续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

反观西方,从"持续收获"思想到资源保护主义再到当代可持续发展观念,整体上都是"悬置目的、改进手段"的学说。无论是实现持续的木材产出、长期稳定的资源利用还是维持几代人满足发展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西方演进道路缺乏整体的、正面的战略目标作为指引。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将脱贫赈灾、经济增长、社会平等、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杂糅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面向当前而非面向未来的。这些目标没有告知实现发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可持续发展最终会将人类文明引向何处。

概言之,中国永续发展思想是在自然环境遭受极大破坏、自然资源持续匮乏的条件下,以实现一个地区或民族的长久兴旺和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为终极目的,深刻重构当前与自然保护和资源利用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环境思想。而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则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技术、社会组织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为了满足当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的发展需求,系统调整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环境思想。

对近代中西方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相关史料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复杂的思想源流。近代欧洲林业实践中的"持续收获"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中国开启不同的思想演进道路。在美国,"持续收获"思想与进步主义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反对资源垄断、强调当代人公共福祉的资源保护主义,并与马尔萨斯人口论、追求长期公共福祉的经济学说以及自然保护主义等思想相结合,最终发展为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但是,这只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演进过程中的一条道路,而非唯一道路。在中国,"持续收获"思想与近代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强调生态综合效益、为长远子孙后代考虑、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的"永续利用"思想。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种主要关注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思想最终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的永续发展思想，并真正地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结合。对中国永续发展思想历史的挖掘和梳理，不仅揭示出现当代全球环境思想发展的丰富维度，有助于驳斥当前流行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历史叙述。而且，中国永续发展思想，因其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宏阔的空间尺度，能够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目前由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念主导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尤其是在提升对长远未来和整体战略目标的研究方面。进一步阐释永续发展思想，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研究和实践，也将有助于建构带有真正全球性特征并体现出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的国际环境治理话语体系。

注释：

① Herman Daly, Beyond Grow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p. 2.

②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Gland: IUCN - UNEP - WWF, 1980.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2 页。

④参见 Jennifer Elliott,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4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钱易、唐孝炎主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曲向荣主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⑤ Jeremy Caradonna, Sustainability: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

⑥⑧ Justice Mensah,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ning, History, Principles, Pillars, a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Action: Literature Review," 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5, No. 1, 2019, p. 6.

⑦John A. Dixon, Louise A. Fall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Origins, Extensions, and Usefulness for Policy,"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Vol. 2, No. 1, 1989, pp. 73-84.

⑨Henk Van Zon, Geschiedenis & Duurzame Ontwikkeling: Duurzame Ontwikkeling in Historisch Perspectief, Enkele Verkenningen, Nijmegen: Netwerk duurzaam hoger onderwijs, 2002, pp. 1-9.

⑩[荷]埃琳娜·卡瓦尼亚罗、[荷]乔治·柯里尔：《可持续发展导论》，江波、陈海云、吴赟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8 页。

⑪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4.

⑫Ulrich Grober, Sustainability: A Cultural History, trans. Ray Cunningham, Devon: Green Books, 2012, pp. 19-20.

⑬Christof Mauch, The Growth of Tre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Sustainability, München: oekom verlag, 2014.

⑭Jeremy Caradonna, Sustainability: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5.

⑮樊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历史演进及其当前困境探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88-98 页。

⑯Ulrich Grober, Deep Root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chhaltigkeit), Berlin: WZB, 2007, p. 7.

⑰[日]志贺泰山：《森林经理学前编》，东京：大日本山林会，1895 年，第 7 页。

⑱Edward Steinmueller, " The Pre - Industrial Energy Crisis and Resource Scarcity as a Source of Transition," Research Policy 42, Vol. 42, No. 10, December 1, 2013, pp. 1739-1748.

⑲Gabriel Hemery, "In Retrospect: Sylva," Nature, Vol. 507, No. 7491, 2014, pp. 166-167.

⑳该书全名为《森林，或论陛下领土内的森林树木和木材增殖》(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 Tre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Timber in His Majesties Dominions)。

㉑Ulrich Grober, Deep Root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chhaltigkeit), Berlin: WZB, 2007, p. 14.

㉒Ulrich Grober, Sustainability: A Cultural History, trans. Ray Cunningham, Devon: Green Books, 2012, p. 84.

㉓[美]阿瑟·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61-64 页。

㉔[澳]彼得·哈里森：《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249 页。

㉕[美]克拉伦斯·格拉肯：《罗得岛海岸的痕迹》，梅小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 页。

㉖Gifford Pinchot, Breaking New Grou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 27.

㉗Bernhard Fernow, The Economics of Forest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02, pp. 2-7.

㉘㉚Mrs. Gifford Pinchot, "Gifford Pinchot and the Conservation Ideal," Journal of Forestry, Vol. 48, No. 2, 1950, pp. 83-86.

㉙Bernhard Fernow, The Economics of Forest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02, p. 85.

㉛㉝John Robinson, "Squaring the Circle? Some Thoughts on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48, No. 4, 2004, pp. 369-384.

㉝Jeremy Caradonna, Sustainability: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1.

㉞[日]志贺泰山:《森林经理学前编》,东京:大日本山林会,1895 年。

㉟[日]奥田贞卫:《森林学》,东京:博文馆,1898 年,第 85-89 页。

㊱[日]奥田贞卫:《森林学》,樊炳清译,上海:江南总农会,1900 年。

㊲孙钺:《实用森林学》,上海:新学会社,1913 年,第 12-13 页。

㊳王长富:《中国林业经济史》,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09-210 页。

㊴㊵农矿部设计委员会特种会议秘书处编:《农矿部林政会议汇编》,南京:农矿部设计委员会特种会议秘书处,1929 年,第 76、160 页。

㊶曾济宽:《林业经济学》,上海:新学会社,1933 年,第 61 页。

㊷殷良弼:《中等林学大意》,上海:中华书局,1934 年,第 5 页。

㊸任承统:《绥远省经济建设之讨论》,《新农村》1934 年第 10 期,第 1-26 页。

㊹㊺安事农、凌道扬:《森林的利益》,南京:农矿部林政司,1929 年,第 3、28 页。

㊻曾济宽:《林业经济学》,上海:新学会社,1933 年,第 61-62 页。

㊼李士瀛:《中国林业问题》,《实业杂志》1925 年第 2 期,第 50-61 页。

㊽㊾郝景盛:《中国林业建设》,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年,第 81-82、90 页。

㊿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第 60-65 页。

(51)(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周恩来论林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58、109 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林业与生态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7 页。

(54)柴恒忠:《森林永续利用理论研究管见》,《林业勘查设计》1981 年第 1 期,第 19-21 页。

(55)傅政德:《新技术革命孕育着农业发展的飞跃》,《经济问题探索》1984 年第 11 期,第 8-13 页。

(56)宋健:《发展环保产业保证永续发展》,《环境保护》1992 年第 6 期,第 5-10 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850 页。

(58)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永续发展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2 期,第 15-20 页。

(59)张乐、李陈、苏佳颖:《台湾地区永续发展与环境治理概述及启示》,《阅江学刊》2016 年第 2 期,第 78-88 页。

(60)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61)骆承政、乐嘉祥:《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北京:中国书店,1996 年。

(62)赵万武:《浪漫与理性的抉择:自然价值与吉福德·平肖资源保护理念的构建》,《史学月刊》2022 年第 5 期,第 107-113 页。

(63)Gifford Pinchot,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0, p. 42.

(64)[美]彼得. P. 罗杰斯、[美]卡济. F. 贾拉勒、[美]约翰. A. 博伊德:《可持续发展导论》,郝吉明、邢佳、陈莹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

(65)(66)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48、80 页。

(67) Mrs. Gifford Pinchot," Gifford Pinchot and the Conservation Ideal," Journal of Forestry, Vol. 48, No. 2, 1950, pp. 83-86.

(68)樊宝敏:《中国林业思想与政策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3-66 页。

(69)顾恒德:《森林与社会》,上海:新亚书店,1934 年,第 6、63 页。